



荻生徂徠對明代宗唐詩學的接受：  
以《唐後詩總論》為中心

メタデータ	言語: eng 出版者: 公開日: 2018-04-17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顧, 春芳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s://doi.org/10.24729/00004280">https://doi.org/10.24729/00004280</a>

## 荻生徂徠對明代宗唐詩學在接受

### —以《唐後詩總論》為中心—

顧春芳

以荻生徂徠（1666—1728年）為首的古文辭學派是日本江戶時期一個有著很大影響的學派，它是李攀龍（1514—1570年）與王世貞（1526—1590年）為代表的明代後七子的復古文論為其主導思想的。筆者以為荻生徂徠在接受明代詩學時，深受以王世貞為代表的宗唐詩學的影響，本文擬將荻生徂徠所著的《唐後詩總論》為中心展開論述，探究他是如何接受以王世貞為代表的宗唐詩學的？而這樣的接受又對古文辭學派及江戶時期的詩學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荻生徂徠為了本派門人學習漢詩有更多更好的範本，親自主持編選了一部明人詩集《唐後詩》，其中所選主要為明代前後七子的詩作。《唐後詩》的序為荻生徂徠最為得意的弟子服部南郭所撰寫，而荻生徂徠則為此集寫了《唐後詩總論》。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唐後詩總論》的構成，它放在《唐後詩》總目錄的後面，題為《唐後詩總論》，共三十九頁。其中所引關於明詩評論的篇幅共有三十二頁，開首即是“胡元瑞曰：……”，接著為“王元美曰：……”。其中被引用最多的當為王世貞與胡應麟，其次是王世懋。三家之外，還有何景明等人的，只是多為一則或二則。而荻生徂徠闡述一己之見的篇幅只佔了七頁，收在《徂徠集》中的則只有這七頁，並以《題唐後詩總論》為篇名。為便於分別，下文中荻生徂徠闡述已見的部分就用《題唐後詩總論》為名。

《題唐後詩總論》雖然只有七頁，但卻是荻生徂徠有關詩評方面最為全面的著作，它與《唐後詩總論》中所引的明人詩評結合在一起，可以說是彌補了當時詩評的不足。而其中的宗唐詩學思想則對江戶時期的漢詩創作起著不容忽視的影響。

#### 一

在這一章裡我們就《唐後詩總論》來展開論述，來看荻生徂徠是如何接受明代詩學的。荻生徂徠的《題唐後詩總論》一開頭就這樣寫道：

右諸公論，大抵盡明詩矣。祇人心不同如面，即二美友于，未免微有軒輊。是天生才未盡，而明之不能盡唐詩也。要而言之，二李、二王、仲默、明卿、昌穀、子業，斯其至者已。獨余則謂，于鱗於盛唐諸家外，別搆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細視其集中，一篇一什，亦皆粹然，不外斯色，所以為不可及也。元美一身具四唐，隨年紀以相升降，可謂奇事矣。敬美、子業，介乎盛中之交，此諸公所不言也。……<sup>1</sup>

這段話中“獨余則謂”後的這段話是荻生徂徠想要強調的，他稱讚李攀龍的詩能“於盛唐諸家

<sup>1</sup>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見《唐後詩》。據新潟大學佐野文庫所藏元文五年（1740年）的《唐後詩》刻本。以下均略為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

外，別構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而“別構高華一色”中的“高華”，在《唐後詩總論》所引詩評中有好幾處，王世貞的就有兩處，一處是：

于鱗自棄官以前，七言律極高華。然其大意，恐以字累句以句累篇，守其俊語，不輕變化。故三首而外，不耐雷同。晚節始極旁搜，使事該切，措法操縱雖思探溟海，而不墮魔境。世之耳觀者，乃謂其比前少退，可笑也。歌行方入化而遂歿，惜其不多，寥寥絕響。<sup>2</sup>

這段話是評李攀龍七言律的，王世貞認為在“棄官以前”，雖然其“七言律極高華”，但“守其俊語，不輕變化。故三首而外，不耐雷同”。倒是“晚節始極旁搜，使事該切，措法操縱雖思探溟海，而不墮魔境”。只是可笑世人並未能看到這一點，反而認為李攀龍的七律較棄官之前退步了。最後一句是評其歌行的，因其不多，所以也未詳加評述。

還有一處是王世貞在評前後七子等明人詩時說的一段話：

李于鱗如峨眉積雪，閩風蒸霞，高華氣色，罕見其比。又如大商舶明珠異寶，貴堪敵國，下者亦是木難火齊。<sup>3</sup>

其中的“高華氣色”與荻生徂徠所說的“高華一色”更為接近，如與後面提到的“細視其集中，一篇一什，亦皆粹然，不外斯色”並看，就再清楚不過了。從中還可見到這些詩篇無一不經過他的細細品味，得出了“所以為不可及也”的結論，再與“罕見其比”對照，可見荻生徂徠所說的“高華一色”即“高華氣色”。

《唐後詩總論》中，評李攀龍詩“高華”的引文，還有一處是胡應麟（1551-1602年）的，引文如下：

嘉隆並稱七子，要以一時制作，聲氣傳合耳。然才殊有徑庭。于鱗七言絕，高華傑起，一代宗風。明卿七言律，整密沈雄，足可方駕。然于鱗則用字多同，明卿則用句多同。故十篇而外，不耐多讀，皆尺有所短也。子相爽朗以才高，子與森嚴以法勝，公實縝麗，茂秦融合，第所長俱近體耳。<sup>4</sup>

其中提到“于鱗七言絕，高華傑起，一代宗風”，值得引起注意的是這裡的“高華傑起，一代宗風”是對李攀龍七言絕的評價。荻生徂徠在《唐後詩》中收了李攀龍的絕句三百首，數量之多，位居所收明代詩人之首，當與此有關。

我們回過頭再來看荻生徂徠的“獨余則謂”，就會發現他所推崇的是宗唐的詩學思想，李攀龍的既能“於盛唐諸家外，別構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其實已是明確了盛唐的詩作乃是詩之最高境界。而後的“元美一身具四唐”中的“四唐”，當為初唐、盛唐、中唐與晚唐，“可謂奇事矣”，也可看作讚賞，若是將其與對李攀龍詩的評價相對照，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荻生徂徠以盛唐為最。

荻生徂徠的宗唐詩學思想還可以從《唐後詩總論》中所引之文中可見一斑，關於前後七子學

<sup>2</sup>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

<sup>3</sup>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

<sup>4</sup>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

唐詩的評述，可以說是隨處可見。如胡應麟的“國朝惟仲默、于鱗、明卿、元美，妙得其法，皆取材盛唐，極變老杜”。及“于鱗七言律，所以能奔走一代者，實源流早朝、秋興、李頎、祖詠等詩。大率句法得之老杜，篇法得之李頎”。還有“國朝學杜者，獻吉歌行如龍跳天門，明卿近體如虎臥風閣。獻吉得杜之神，明卿得杜之氣，皆未嘗用其一語，允可為後學法”。王世懋有“子美之後，能為其言而真足追配者，獻吉、于鱗兩家耳。以《五言》言之，獻吉以氣合，于鱗以趣合”。“家兄讖獄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老句，便自旗鼓中原”。胡應麟還有一處是將明前後七子與唐人作比較，引文如下：

以唐人与明並論，唐有王、楊、盧、駱，明則高、楊、張、徐；唐有工部、青蓮，明則弇州、北郡；唐有摩詰、浩然、少伯、李頎、岑參，明則仲默、昌穀、于鱗、明卿、敬美才力悉敵。惟宣城際，無陳、杜、沈、宋比。而弘正、嘉隆，羽翼特廣，亦盛唐所無也。唐歌行如青蓮、工部，五言律排律如子美、摩詰，七言律如杜甫、王維、李頎，五言絕如右丞、供奉，七言絕如太白、龍標，皆千秋絕技。明則北郡、弇州之歌行，仲默、明卿之五言律，信陽、歷下、吳郡、武昌之七言律，元美之五言排律、五言絕，可謂異代同工。至騷不如楚，賦不及漢，古詩不逮東西二京，則唐與明一也。

胡應麟在此將明詩與唐詩作比較，將王世貞、李夢陽與杜甫、李白相比，認為兩者不相上下。又指出前後七子中的何景明、徐禎卿、李攀龍、吳國倫、王世懋的才力可與王維、孟浩然、岑參等唐代詩人匹敵。他還指出無論是歌行、五言律、七言律還是五言絕與七言絕，前後七子的詩都不下於唐詩，“可謂異代同工”。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其中也有中唐和晚唐的詩人，也就是說荻生徂徠並不排斥中唐和晚唐，關於這一點擬在下一章裡作詳細論述，此處不再贅述。因胡應麟在此處是將兩個群體做比較，所以不免顯得籠統。不過《唐後總論》中也有不少寫得具體的引文，如下面一段引文：

使事，自老杜開山作祖，晚唐若李商隱，深僻可笑。宋人一代，坐困此道，後之作者，監戒前規，遂為大忌。國朝諸公，間有用者，束而未暢。惟弇州信手匠心，天然澹泊，千秋妙解，獨擅斯人，觀察繼興，尤得三昧，極盛之後，殆難繼矣。<sup>5</sup>

這段話是胡應麟評王世貞學杜甫使事的，其中“信手匠心，天然澹泊，千秋妙解，獨擅斯人，觀察繼興”幾句可以說是既形象又生動。

《唐後詩總論》還引了王世貞的關於明人詩作特點的評述，引文如下：

高季迪如射雕胡兒，伉健急利，往往命中。又如燕姬靚妝，巧笑便辟。邊庭實如洛陽名園，處處綺卉，不必盡稱姚魏。又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顧華玉如春園畫花，陔靡不少。高子業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又如衛洗馬言愁，憔悴婉萬，令人心折。薛君采如宋人葉玉，幾奪天巧。又如倩女臨池，疎花獨笑。王稚欽如良馬走坂，美女舞竿，五言尤自長城。楊用修如暴富兒郎，銅山金埒，不曉吃飯著衣。皇甫子安如玉露顰眉，清雅絕人，惜輕纖短幅，不堪裁剪。喬景叔如清泉放溜，新月掛樹，然此景殊少，不耐縱觀。

<sup>5</sup>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

徐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冷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又如飛天仙人，偶游下界，不染塵俗。何仲默如朝霞點水，芙蓉試風。又如西施、毛嬙，毋論才藝，却扇一顧，粉黛無色。李獻吉如金翅摩天，神龍戲海。又如韓信用兵，眾寡如意，排蕩莫測。李于鱗如峨眉積雪，閩風蒸霞，高華氣色，罕見其比。又如大商舶明珠異寶，貴堪敵國，下者亦是木難火齊。宗子相如渥注神駒，日可千里。未免齧決之累。又如華山道士，語語煙霞，非人間事。梁公實如綠野山池，繁雅勻適。又如漢司隸衣冠，令人驚美，但非全盛儀物。謝茂秦如大官舊庖，為小邑設宴，雖事饌非奇，而鉅釘不苟。<sup>6</sup>

荻生徂徠非常欣賞這段詩評，在給友人和門下弟子的信中也經常引用。而明前後七子幾乎也都在其中了，荻生徂徠在編選《唐後詩》時也選了王世貞在此品評過的所有詩人的詩。

從上面所舉的引文中，我們可以看到荻生徂徠尤其看重王世貞與胡應麟的宗唐詩論。而他在《題唐後詩總論》中有一段關於日本漢詩的論述，其中所表現的也是宗唐的詩學思想。荻生徂徠這樣寫道：

本邦之盛，其在寧平之際乎，如晁衡、藤萬里、常嗣、野篁，廁諸唐人，難可辨識。暨乎皇華不航，而人不識華音。讀書作詩，一唯和訓是憑，遂至弱海萬里，其弊也視麗若華。則裴頌倡陋，長慶之風蔓延朝著，誦傷侷雅，則元僧流毒，蘇黃之派汎濫江湖，七百年來，謂之無詩可矣。<sup>7</sup>

在荻生徂徠看來，日本的漢詩創作的鼎盛期是在“寧平之際”，即奈良時代與平安時代。當時的代表詩人晁衡即阿倍仲麻呂、藤原萬里、藤原常嗣與小野篁，而他們的所作之詩，與唐代詩人的詩作放在一起，也“難可辨識”。可惜的是在這以後，文人不識華音，讀書作詩，用的都是和訓，以至於讀書只能理解其中的意思，而不能看到文章的文采燦爛，即所謂的“辭”。而用和訓來寫詩也是如此，毫無生趣可言。以至於宋儒的文章作風佔據了整個文壇，所以他認為盛唐以後“七百年來，謂之無詩可矣”。

由於荻生徂徠接受的以王世貞為代表的宗唐的詩學思想，因此在編選《唐後詩》時，所選詩篇也不出所引詩評之範圍。而其中所選詩篇的數量也是以李攀龍與王世貞為最，這是因為荻生徂徠認為李攀龍的詩能“別構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王世貞能“一身具四唐”。在《唐後詩》中，七言絕所選，李攀龍三百首，王世貞一百十三首，吳國倫三十二首，李夢陽四十二首，何景明十七首，徐禎卿十四首，邊貢十三首。其他的明詩人都在十首以下。五言律所選，李攀龍一百首，王世貞一百首，徐中行四十七首，吳國倫三十四首，王世懋二十四首，謝榛三十六首。其他的明詩人也都在十首以下。五言絕所選，王世貞五十六首，李攀龍二十五首，李夢陽四十五首，徐禎卿十八首，何景明十首，其他的明詩人也都在十首以下。

荻生徂徠編選《唐後詩》的宗旨是“取其合盛唐者”，關於這一點他在給山景周南的信中說得很清楚，信中這樣寫道：

……李、王大才，其於古，未嘗屑屑乎做訓詁，而退省其文章，亦足以發也。故余特賞

<sup>6</sup>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

<sup>7</sup>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

二公者，為其能梯航乎古也，不獨取其詞藻也。次公答東壁，辯駁甚至，予傍看大喜。亡論其言當不當，其能以此心讀二公集，二公之骨真不朽矣哉。予問者又為鬻生苦唐詩選大家家，不足以廣其思。故手汰二公近體若干首，一取其合盛唐者，略加箋釋，行將問梓。……<sup>8</sup>

在信中荻生徂徠稱讚李攀龍與王世貞的才學，表示了對李、王的敬意。同時也為山泉周南能讀李、王的文集而感到高興，言語之間充滿了讚許之意。而這裡所說的“略加箋釋，行將問梓”的著作，就是《唐後詩》。從中可以知道是選了李、王二人所作近體詩中的若干首，其目的就是拓寬當時學子的思路。而他選詩的標準是“取其合盛唐者”，其中只提“二公”，可見他對李攀龍與王世貞的詩是推崇之至，同時也表明了他只接受以王世貞為代表的宗唐詩學思想。

## 二

在這一章裡，我們再來看一看散見在荻生徂徠其他文章裡的有關明代詩學的言論，並結合《唐後詩總論》來展開論述。

荻生徂徠在《題詩學三種合刻》中這樣寫道：

古詩以漢魏為至，近體以開天為至，是自風氣所會，雖其人，不自知其然。降焉而六朝，而中晚，愈日愈失，亦不自知其然。世之與詩汙隆也，持是說者，以世廢學。然宋人始知學唐而唐益遠。至於明人，則復古復唐，是豈世之罪哉？學之不得其方也。學之不得其方也，論未定也。論乃定之嚴、徐，功亦偉哉，之二子者，書具存。嗣是則二美、元瑞，皆有所論撰，可謂備矣。《詩藪》既刊行，《卮言》卷軼頗浩，未易上木。石叔潭且受校三書，授諸劄劂氏。予既已惡夫以世廢學者，乃題其首日：學之方也，遵前修定論，習以熟之，久而化之。迨其化也，明如觀火，是謂之物格而後知至。……<sup>9</sup>

在這裡荻生徂徠強調了詩學著作的重要性，指出了學詩不得其方的真正原因是“論未定也”，而他所推崇的是王世貞、王世懋與胡應麟之所論。他要學詩之人，學習“二美、元瑞”所修之定論，“習以熟之，久而化之。迨其化也，明如觀火，”即只要持之以恆，就能領會其中的奧妙，作出好詩。文中還可以看到他對王世貞的《卮言》與胡應麟的《詩藪》是極為重視，這也是《唐後詩總論》裡所引大多出於此二書的原因吧。

再看一下荻生徂徠給江若水信裡的一段論述：

吾東方學者，以和訓讀華書，故其病多得意而不得語。吾於崎嶇邊生書具道之，今謹附上，伏請賜覽，足下或欲因此一激遂望最上乘。則一二年間東來，目擊道存，似難非難，似易非易，要在棒喝下一汗，而非言語文字所能傳也。雖然，足下或能以《滄浪詩話》、《延禮》、《品彙》、于鱗《詩刪》、弇州《卮言》、元瑞《詩藪》，朝夕把玩，詩亦在阿堵中，何必待不佞也？吁不備。<sup>10</sup>

<sup>8</sup> 《與泉次公》（第三書），《徂徠集》卷二十一。

<sup>9</sup> 荻生徂徠《題詩學三種合刻》。《徂徠集》卷十九。

<sup>10</sup> 荻生徂徠《與江若水》。《徂徠集》卷二十六。

這是一封給江若水的回信，面對江若水的困惑，荻生徂徠告之有些道理並非一定要由自己在信中說明，只要讀懂讀透“《滄浪詩話》、廷禮《品彙》、于鱗《詩刪》、龔州《厄言》、元瑞《詩藪》”，就能明白作詩之道了。由此可見他對這些詩學著作的重視，而“何必待不佞也”一則是他的謙虛，二則說明他的論點也是出於上述諸書。

再看荻生徂徠在《譯文筌蹄言十則》裡的一段話：

……故欲學唐人詩，便當以唐詩語分類抄出。欲學選詩，便當以選詩語分類抄出。各別貯篋中，不得混雜，欲作一語，取諸其篋中，無則已，不得更向他處搜究。如此日久，自然相似。如其宋、元及明袁中郎、徐文長、鐘伯敬諸家，慎莫學其一語片言，此學詩第一要法。但唐詩甚少，當補以明李于鱗、王元美等七才子詩，此自唐詩正脈。予近作柏梁餘材，即是物也，未成集。<sup>11</sup>

這段話是教人如何學唐人詩的，其中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如其宋、元及明袁中郎、徐文長、鐘伯敬諸家，慎莫學其一語片言，此學詩第一要法”的論述。關於宋、元及明袁中郎、徐文長、鐘伯敬諸家，荻生徂徠在《唐後詩總論》都有論及，尤其是對袁宏道與鍾惺詩學理論的批評，言辭甚為激烈。其中這樣寫道：

嗚呼，二子生宋元後，而自謂不膚、不狹、不熟、不模擬也，安足以欺知者哉？萬古神奇，悉在陳腐中。天不能舍鸞花而別為春，離婁、公輸子非規規則不能為方圓，即其自詫神奇，亦元瑞所謂古人棄去拾以自珍者，豈不憫哉？古聖人之言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是千萬世言詩者之刀尺準繩。詩自三百以至李、杜，雖其調隨世移，體每人殊，而一種色相，辟諸春風吹物，燁然可觀者，迺為不異也。此色一壞，秋冬蕭索之氣至焉，豈翹為詩道言哉。祇其為人，拗不師古，專而自用，喜快心，惡醞藉，喜放縱，惡拘束。儒者有李斯、象山、陽明、卓吾，詩有東坡、文長、中郎、伯敬。天生此一種人物以轉盛趨衰，破醇就漓，可畏之甚也。故予於後，特收戴氏二則，以立之防已。<sup>12</sup>

這段話是針對袁宏道與鍾惺“極口詆毀王、李，為膚為熟為狹為模擬”<sup>13</sup>而言的。袁、鍾二人自視甚高，以為自己“不膚、不狹、不熟、不模擬”，但在荻生徂徠看來，即便是他們自詡為“神奇”者，也不過是胡應麟所說的“古人棄去拾以自珍者”。而其中的“詩自三百以至李杜，雖其調隨世移，體每人殊，而一種色相，辟諸春風吹物，燁然可觀者，迺為不異也”，更是對李攀龍詩的肯定，此處將李白、杜甫的詩與《詩經》並提，旨在強調表現“色相”的“辭”的重要性。他指出詩之聲律隨著時代而變，詩之體也因人而異，唯獨表現“色相”的“辭”是不變的，因此李杜詩中之辭所表現的“色相”與《詩經》中的是一樣的。他還說袁宏道與鍾惺的為人是“拗不師古，專而自用，喜快心，惡醞藉，喜放縱，惡拘束”，因此危害極大，所以在《唐後詩總論》的最後，他特意引了戴道默的二則批評袁宏道與鍾惺的詩論，以此為防。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荻生徂徠所接受的是以王世貞為代表的明代宗唐詩學思想。王世貞的《厄言》與胡應麟的《詩藪》對他的影響可以說是很大的。而對袁宏道與鍾惺的批評也是

<sup>11</sup>荻生徂徠《譯文筌蹄言十則》。《徂徠集》卷十九。

<sup>12</sup>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

<sup>13</sup>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

為了防止初入門的弟子不明就裡而誤入歧途。

還有，在上一章裡談到荻生徂徠並不排斥中唐和晚唐，這在他給江若水的信中也可見到，信中這樣寫道：

……文章天下公器，董狐筆豈輕高下其手乎？假使獲溫足下，亦所不悔。且夫中唐亦非易易，昔者錢起與王維輩相酬和也，尚且不欲立盛唐諸公下風，於是乎新調遂起，可謂豪傑士矣。余州晚年，枕藉長慶。而謝茂秦在七子中，獨稱異族，則足下亦何恨也。足下所師，非鳥鳴春邪。鳴春晚唐宗匠，雖孟、賈所不及也。足下乃以中唐自鳴，大抵海內言詩者，不超宋元而上之矣，間有一二唐語，其調錯雜不足稱述也。獨鳴春先生，劇濯自振，克成一家，足下青藍，不循故步，故予嘗謂京畿間，孰能過此二子？鳥紗擎天，吾其誰欺？若或以盛晚相猜，殆非知詩者。蓋詩以格為別，高華雄渾，古雅悲壯，是盛唐所尚也，而足下詩有此邪。流暢圓美，宛切動人，是中唐所長也，足下則肖之。新奇尖巧，刮目快心，是晚唐所擅，而非鳴春不足以當之也，足下以此自印，自當得之已。又承足下於不佞詩未得其意味所在，此一語所以墮中晚也。夫盛唐主格，中唐主情，晚唐主意。古人曰：“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可見情意二者非最上乘焉。<sup>14</sup>

荻生徂徠與江若水書信往來，信中多有詩詞酬唱，有時也討論漢詩創作。一日“因鳳洲來訪”，荻生徂徠“從旁窺見足下書，乃知足下激甚也”，此處的足下即江若水，因何激甚？這段話裡也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從開頭兩句就可得知荻生徂徠在此可謂是不吐不快，但在這段話裡他還是對中晚唐有所肯定的。只是江若水不解自己詩中的“意味所在”，其實就是沒能理解詩中的“高華氣色”。最後的“可見情意二者非最上乘焉”，更是明言自己以盛唐為最的看法。再看《題唐後詩總論》的最後一段話：

……故今抄明詩，傳之寒鄉學者，使藉是以識百年內外，亦有能游泳夫開元天寶之盛者已。”<sup>15</sup>

這段話的意思是《唐後詩》中所選的明詩，都是“合盛唐者”。他要讓窮山僻壤的學者也能知道距今不過百年的明人，“亦有能游泳夫開元天寶之盛者”。由此可見荻生徂徠的宗唐詩學思想是以盛唐為最的。

### 三

在這一章裡就荻生徂徠接受明代宗唐詩學思想的意義所在展開論述。

荻生徂徠在《唐後詩總論》中所表現的對宗唐詩學在接受也影響了古文辭學派的弟子，因為荻生徂徠將《唐後詩》作為古文辭學派門人的必讀書之一，並要求門人在漢詩創作上要多下工夫。門人初學漢詩創作時，往往不知從何處著手，“故欲學唐人詩，便當以唐詩語分類抄出。欲學選詩，便當以選詩語分類抄出。各別貯篋中，不得混雜，欲作一語，取諸其篋中”，就成了具體的學習

<sup>14</sup>荻生徂徠《與江若水》。《徂徠集》卷二十六。

<sup>15</sup>荻生徂徠《唐後詩總論》。



方法。而《唐後詩總論》裡的宗唐詩學理論則為門人品評漢詩之準則。

而荻生徂徠接受明代宗唐詩學不僅對古文辭學派起了很大的影響，還引起了整個江戶文壇重視，這源於荻生徂徠的弟子服部南郭重新考訂了李攀龍的《唐詩選》一事。服部南郭可以說是荻生徂徠的忠實追隨者，一直在為宣傳古文辭學派的文學主張搖旗吶喊。在弘揚宗唐詩學主張上，南郭做了很多工作，《唐後詩》的序就是由他撰寫的，他還在荻生徂徠的指導下，重新考訂了李攀龍的《唐詩選》。針對當時《唐詩訓解》這部偽託李攀龍之作在儒學界的氾濫，南郭重新考訂了李攀龍的《唐詩選》。南郭還為自己考訂《唐詩選》寫了附言作辯，其中這樣寫道：

初學熟滄浪選，乃後稍稍就諸家讀焉，則左右取之，無不逢其原。諸家則《滄浪詩話》、《品彙》、《正聲》、弇州《卮言》、元瑞《詩藪》，此其傑然者，亦不可不讀焉。蔣氏所注二三評語，諸家已具，讀之可，不讀亦可。仲言解備之掌故，則往往便於質訪，至其解詩意謬妄居半，不必取也。且詩貴典象，祇謂擾心，胡用喋喋解之為。若夫誦三百篇、讀騷、讀選，旁及歷代諸家，人人知之，不待具論。博文約禮，雖小伎亦然。<sup>16</sup>

在這裡南郭指出“初學熟滄浪選，乃後稍稍就諸家讀焉，則左右取之，無不逢其原”，而諸家則是《滄浪詩話》、《品彙》、《正聲》、《卮言》與《詩藪》，這些皆為上乘之作，所以不可不讀。而他對仲舒注與仲言解的態度也是很明確的，仲舒注即《唐詩選》的蔣一葵箋釋本中的注，仲言解即唐汝詢的《唐詩解》中的評解，“蔣氏所注二三評語”都是取自上述諸家。“讀之可，不讀亦可”是婉轉的說法，其真實含義即不須讀，可見他對蔣注是否定的。而仲言解中的掌故雖說便於讀者查找，但其中的解詩意部分則是“謬妄居半，不必取也”。且“詩貴典象”，無需這種喋喋不休的解說。南郭的這段話雖說是為了批評仲舒注與仲言解的，但其宗唐的詩學思想也已在其中了。而最重要的是南郭強調了“《滄浪詩話》、《品彙》、《正聲》、弇州《卮言》、元瑞《詩藪》，此其傑然者，亦不可不讀焉”，而這些都是宗唐詩學的著作。隨著重新考訂後的李攀龍《唐詩選》在江戶文人中的傳播，這些宗唐詩學的著作也開始得到了他們青睞。

## 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從荻生徂徠撰寫的《唐後詩總論》中可以看到他在明代諸多詩學思想中選擇了以王世貞為代表的宗唐詩學主張，而他的宗唐詩學思想的核心是“合盛唐者”。他認為李攀龍的詩再現了盛唐氣象，即“別構高華一色，而終不離盛唐”。而要改變當時漢詩創作萎靡不振的局面，必須學習有著“高華氣色”的唐詩與明詩。而他有感於“唐詩苦少，當補以明李于鱗、王元美等七才子詩”，因為這些詩才是“唐詩正脈”，這就是他編選《唐後詩》的目的。在荻生徂徠的宗唐詩學思想的影響下，門下眾多弟子都以宗唐詩學為品評漢詩之準則。其中以服部南郭為最，南郭重新考訂了李攀龍的《唐詩選》，並為之寫了附言作辯，其中呼籲所有的文人都必須學習《品彙》、《正聲》、弇州《卮言》、元瑞《詩藪》。自此這些宗唐詩學的著作也得以在江戶文人中廣為流傳，可以說荻生徂徠對明代宗唐詩學的接受影響了江戶的文壇。

<sup>16</sup> 服部南郭《唐詩選附言》，見服部南郭考訂《唐詩選》，據服部文庫所藏本。